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重新发现 直觉主义

柏格森哲学新探

尚新建 著



北京大学
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重新发现直觉主义

柏格森哲学新探

尚新建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新发现直觉主义: 柏格森哲学新探/尚新建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ISBN 7-301-04512-3

I. 重… I. 尚… III. 柏格森, H. (1859~1941) - 哲学-研究 N. B565. 51

书 名: 重新发现直觉主义: 柏格森哲学新探

著作责任者: 尚新建

责任编辑: 胡双宝

标准书号: ISBN 7-301-04512-3/B·189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cbs.htm>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室 62752032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排 印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625 印张 190 千字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1.00 元

目 录

序.....	王大庆(1)
前言.....	(5)
第一章 生平和著作	(21)
第二章 时间与绵延	(40)
一、柏格森之前的时间学说.....	(41)
二、柏格森剥离传统的时空学说.....	(53)
三、建立新的形而上学.....	(65)
四、绵延理论.....	(70)
第三章 直觉方法	(85)
一、功利——科学——形而上学.....	(85)
二、本能——直觉：走出传统形而上学的契机.....	(102)
三、几种最有影响的评价	(113)
第四章 变的哲学.....	(130)
一、形象(image).....	(130)
二、知觉和记忆	(140)
三、记忆与绵延	(149)
四、身心关系	(159)

第五章 论道德和宗教(一)	(165)
一、封闭的社会与道德	(165)
二、开放的社会与道德	(179)
第六章 论道德和宗教(二)	(190)
一、静态宗教	(190)
二、动态宗教	(213)
参考文献	(234)
后记	(235)
补记	(236)

序

王太庆

柏格森这位哲学家的名字我们中国人并不陌生，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是学者们评论的热门。因此在抗日战争前夕我还是少年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一位名人，虽然我当时还不知道哲学为何物，却有点想看看他的文章。这个愿望一直保持了好多年，我读柏格森的书还是很少。这是因为抗日战争时期条件十分困难，不容易得到书，我只得到了张东荪先生翻译的《创化论》。这个译本使我对柏格森的思想甚感兴趣，仿佛知道了一点哲学是怎么一回事，这也是促成我后来学哲学的原因之一。后来我又找到了这部书的英文译本，是作者亲自过目修改过的，内容比张译本多好些，这才使我对柏格森的哲学了解得更深一层。以后我还翻译过一篇柏格森的著名论文《形而上学引论》，就这样结束了我对柏格森的研究。

对于柏格森的哲学思想，我本来所知甚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对他的哲学的热忱似乎消退，很少有人提到他，我心中也逐渐淡忘了。最近尚新建先生让我看了他写的一本关于柏格森哲学的新书，这使我心中翻起当年的回忆，好像旧友重逢，不能不由往事进而想到一些摆在面前的事情。我当初读柏格森的书时，是以同情的态度接纳他的哲学思想的，觉得有些地方很对我的胃口，例如他的“生命冲动”的说法，以及“绵延”的观念，“直觉”的提出，我就觉得顺理成章。但是尽管如此，我却并没有全身心地投进去，成为一个柏格森主义者。我喜欢柏格森的文章，觉得写得要比康德、黑格尔好得多，颇有柏拉图、西塞罗的味道，无怪乎他成为诺贝尔

文学奖金的获得者。可是，哲学毕竟不等于文学，它可以带有令人欣赏，甚至遐想的魅力，它的本质却并不在于情感方面的东西。这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认为用情感代替理解是根本违背哲学的原则的，我决不能像某些人那样读了《庄子》就苏苏麻麻地忘乎所以。柏格森尽管风靡一时，我认为也不能因此对他一往情深。

此外，哲学家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他也不可能不带着某种政治倾向，他的哲学原则往往对某种政治倾向有利。人们在研究和评价哲学著作的时候，当然会注意到这种倾向，而这些读者自己也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也不可能不带着自己的那种政治倾向，因而产生党同伐异的结果。柏格森这位哲学家的书中带明显政治倾向的观点是没有的，但是不能说他的形而上学完全与政治倾向绝缘。例如他不谈革命，可是如果像某些人想的那样，不革命就是反革命，那他不是还有一定的政治态度吗？然而，我觉得一种形而上学理论尽管可以与某种伦理观点相联系，却不能把哲学的基本理论，即形而上学部分，同与它有关的伦理观点以至政治观点等同起来，做出独断的结论。那样，就会离开哲学了。可是离开哲学的议论和评价是屡见不鲜的。我不能赞成这种风行一时的评价，正像不赞成用文学欣赏的态度看待哲学一样。

还有一种情况是用科学为准绳去衡量哲学理论。这与上两种情况有所不同，不是直接把人和社联在一起的，它自以为超出人和社会之上，不受感情摆布，铁面无私。在这一点上，科学的确与哲学相同，都是高度的理性认识，甚至就是智慧本身。但是，科学毕竟并不等于哲学，它只是某个方向的智慧，不能说是全面的智慧。哲学必须为一切科学奠定基础，要统帅科学，也就是高于科学。科学需要哲学，这样的事情现在越来越为科学家所承认了。不但自然科学更有更加根本的理论作为根据，就是社会科学也不能仅限于说明现象，能够用于实际，还要向上攀登到更高一层的理论，如经济学家要求建立经济哲学就是一例。因此，在评价一种哲学理论的时

候,如果只是把其中包含的某些合乎现在已经有的科学知识的成分分离出来,作为肯定这种哲学理论的根据,而把与现有的科学知识似乎不合的成分当作否定它的口实,那就离开那更高一层的、根本性的理论说话了,说的就并不是应该说的东西了。

从以上三种情况看,我认为我自己以往对柏格森哲学的看法并不是认识到这种哲学理论的本质,其中夹杂着很多主观的成分。这是因为没有认真地对这种哲学理论做如实的分析,把它放在历史的长河里前前后后地加以测量定位,而只是凭自己的一时好恶,或者听从别人的见解或误导,没有分析批评,看不到真正的发展线索。这样读哲学文章就好像是上市场买菜,只是凭个人的胃口做出来买不买的判断。这样评价就好像盲人摸象,以偏概全,或者像谚语说的那样: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关键就在于是不是以发展的观点看待一切,看待每一种哲学思想。发展是人类到现代才清楚地意识到的,古代哲学家可以发现运动变化,或者发现演化,却没有想到通过对立矛盾而形成的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即使在黑格尔提出发展之后,世界上也不是人人都接受这个观点和方法,在我们这里尤其是如此。甚至有些高谈发展的人一行动就还是使用机械方法,这可以从哲学史的研究中看到,我们讲中国哲学史从发展讲的就很少很少,讲西方哲学史就不断地重复同样的斗争过程,好像人的命运就在于永远长不大似的。

这种可悲的现象在造成极大的破坏之后才开始逆转,因为我们痛定思痛,再也不愿像那样自欺欺人地过浑浑噩噩的日子了。读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我感觉到其中带来了新的信息。作者做出的“重新发现”就表明了他不再走老路,而要用自己的努力探索事情的本来面目。我觉得他的工作对我来说是可以借鉴的,我也要解剖我自己,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前 言

19 世纪中期，中国历史翻开了最屈辱的一页。国人看到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关闭了几千年的大门，深感中国传统的长矛弓箭、木牛流马、万里长城，已经无法保一方国土平安，于是把目光转向西方。

自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南方和沿海一些城市开设机器局、造船厂、兵工厂等，并且用重金聘请西方技师。当时把这种做法称作“洋务运动”，目的是借西方科技，充实中国军事力量。然而，中法之战和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海战，宣告洋务运动彻底失败。失败固然是痛苦的，却也使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洋务运动之所以不能挽救中国，皆因清廷腐败，要想使中国富强，必须改制。

从 1898 年“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改制成为现实。民国的建立是比照西方的葫芦画了一个中国瓢。胡适在“归国杂感”中描述地这样一件事。胡适时国后回到上海，朋友拉他去看大舞台戏。看完戏后朋友对他说，“这个大舞台真正是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你看这大舞台三个字岂不是很新？外面的房屋岂不是洋房？里面的座位和戏台上的布景装潢岂岂不是西洋新式？但是做戏的人……没有一个不是 20 年前的旧古董……你看这 20 年前的旧古董，在 20 世纪的大舞台上做戏，装上了 20 世纪的新布景，却偏要做那 20 年前的旧手脚！这岂不是一副绝妙的中国现势图吗？”^①

^① 胡适：“归国杂感”，见《胡适文存》，第一卷，黄山书社，1996，448—449 页。

胡适友人所言,无非说,改制的成功并不意味这个制度的基础已经彻底挖掉了。人还是那些人,思想还是那样的思想,支撑了几千年封建制度的文化基础依然存在。张勋不是在指日之间就复辟了吗?尽管这场复辟没有持续多久,却使中国知识分子痛切地感到,封建主义的基础是何等牢固!周作人曾经说:“复辟这出把戏,前后不到两个星期便收场了,但是它却留下很大的影响,在以后的政治和文化方面,都是关系极大的。”^①政治方面的影响是直接导致直皖战争和直奉战争,而在文化上则引发了著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蓬蓬勃勃起来的文化上诸运动,几乎无一不是受了复辟事件的影响而发生而兴旺的。”^②新文化运动的主旨,就是批判封建文化,开启民智,让新人在新舞台上唱新戏。当时的学者们清楚地意识到,“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态度的最好解释”。^③在他们看来,批判孔孟之道,批判旧文化,批判旧道德,批判旧体制、批判旧政府,等等,都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种“评判的态度是新思潮运动的共同精神”。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就是对一切传统的东西进行普遍怀疑。既然旧价值要受到普遍怀疑,那么我们依据什么去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呢?学者们再一次把目光指向西方。这就是20世纪中国的西学东渐过程。西学东渐与洋务运动的差异在于,洋务运动旨在强兵,而西学东渐则在于开启民智,塑造新人,从根本上解决富国利民的问题。一时间,远自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近到正在西方盛行的种种思潮,如尼采的权力意志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罗素的逻辑实在论、杜威的实

①② 周作人:“蔡子民”,见《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第130页。

③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见《胡适文存》,第一卷,黄山书社,1996,第528页。

用主义、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等等。这些西方思想如潮水般地涌入中国。当时的一些热门刊物,如《东方》、《民铎》、《新青年》、《学习》等杂志,或辟专栏讨论西学,或出专号吸引国人视线。本世纪初,西学在中国颇风光了一阵,而且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柏格森哲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中国的。中国研究柏格森的时间,与柏格森风靡世界的时间几乎同步,其热烈和深刻程度并不比世界其他国家逊色。李石岑先生曾经这样描述当时的柏格森研究:“近今评柏格森哲学之著述,不下数百十种。誉之者称为康德以来之最富独创,且永传后世之产物……然毁之者则大反:是至诋为今于怀疑论,或陷于虚无论,至以‘盲人在黑暗中捉猫’为喻。”^①洋洋数十百种讨论,无论赞誉与贬诋,都充分表现出柏格森哲学进入中国之后引起的激烈讨论,也足以表现出当时中国学术界思想活跃的程度,以及中国学人力图寻找强国之路的急切心态。不仅如此,也展示了当时学人的远见卓识。

中国学人介绍研究柏格森哲学,从发生到高潮,最后到沉寂,前后大约经历了40年左右。即,由本世纪初进入中国,五四运动前后讨论达到高潮。进入30年代,讨论逐步接近尾声。40年代由于战乱和其他原因,讨论基本结束。从1949年到现在,柏格森似乎再也没有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重视。80年代初,当西学再次东渐时,本世纪初引起中国学术界讨论的叔本华、尼采、罗素、杜威、早期逻辑实证主义等,都再次引起人们的兴趣。遗憾的是,却少有入重新提及柏格森。而此时的西方世界,已经再度响起“回到柏格森”的呐喊。这种呐喊并不是因为“老祖母的衣服最时髦”,而是因为20世纪西方哲学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之后,逐渐意识到,引起20世纪哲学发生重大变化的人,并没有随着他们的逝去而过时。到目前为止,这种变化依然在这几个入开辟的道路上缓慢行走。在这种情况

① 李石岑:《李石岑论文集》,商务印书馆,第58页。

下,学人再度把目光投向本世纪初的风云人物,就在所难免了。笔者并不认为,西方感兴趣的,我们也一定要感兴趣,而是认为,如果目前西方哲学的发展依然沿袭本世纪前期哲学家所提出的思想,那么重新研究这些哲学家,不但可以深刻理解当代的西方哲学,或许还可以找到西方哲学在未来世纪发展的契机。况且,对于柏格森,中国人原本不陌生。重新发现柏格森在中国并不是从零开始。前辈学者为我们留下一笔丰富的遗产,我们的任务是如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现代人眼光出发,把柏格森哲学的全部价值尽最大可能挖掘出来。让中国的西学研究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是中国几代学者的希望。何时能达到这个目标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至少我们应该尝试去做。

二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柏格森哲学研究随着1920年《民铎》杂志出版柏格森专号而达到高潮。当时对柏格森哲学的讨论范围很广,学者们大都根据自己的知识诠释柏格森。笔者仅就讨论比较热烈的几个问题做一简单介绍,以使读者初步领略当时讨论的水平,及其时哲学界所关注的焦点。尽管笔者撰写柏格森的时间与前辈们相差近80年,尔今的西方哲学与当时相比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国人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亦今非昔比,然而,笔者仍然以为,就柏格森学术而言,甚至就西方哲学的研究而言,我们的前辈功不可没。恐怕不应忘记,自从康熙年间,就不断有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西方哲学的一些著作(为数很少)也曾经译成中文,但是,除了帝王及上层王公之外,绝大多数人根本看不到它们。那些能够看到它们的人,却又根本无意研究这些玩意儿。因此,尽管从时间上看,西方哲学进入中国已颇有些年头,但是,真正使她成为中国人瞩目的一门学问,并且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影响的,确实是20世纪的事。中

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说法并不为过。在这一进程中,如果没有研究西学的前辈,便没有现在的西方哲学研究。后人对此当永远感谢他们。笔者在这里将把前辈的研究客观地介绍给读者。

柏格森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

柏格森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据什么地位的问题,直接涉及如何看待西方哲学的历史和现状问题。对中国哲学界来说,这个问题表明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水平。

范寿康先生认为,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哲学大都看重演绎法,“大抵先立主观的独断的命题,再从这个命题依照一定的形式法则得相当之结论。”^①他认为,“中世纪倾覆以后,文化勃兴,近代哲学也逐渐隆盛起来。1620年培根本著《新机关》,^②于是归纳法的基础遂以成立,这个归纳法在英国经验派哲学里面逐渐发达,其形式及其方法也渐趋于精密完全。”^③他认为,培根的归纳法不仅开辟了哲学的新纪元,而且,近代自然科学也以这种方法为依据得以长足进展。尽管如此,“在哲学研究上我们只用归纳法的时候,总觉得有些不足。”因为“归纳法所获得的根本元理终不免是后天的”。他指出,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提出直观,是想“预立感性及理性以外的心的能力”,但实际上,康德的直观还不是这种心的能力,它只属于认识论范围,还不是形而上学。费希特和谢林所讲的“知的直观”,才是这种“心的能力”。以直观或者说直觉为方法的哲学便是直觉主义哲学。范先生认为,这种哲学是形而上学,因为“它不以知识批判为本务”,而且与以往的形而上学不同。柏格森把直觉加入

①③ 范寿康:“直观主义哲学的地位”,《民铎》,1920,柏格森专号。

② 这里的《新机关》就是《新工具》。

了从来都是理性独占的地盘。

冯友兰先生十分重视方法论问题,他认为,方法论的不同不但将哲学家与非哲学家区别开来,而且“因方法论的不同而分出许多派别,生出许多争论”。西方流行的传统方法是分析的方法,“分析的方法把活东西变成死概念”。人执著于死概念便不能了解“全的真实”,这就是现在西方流行的“智识主义”,它是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的传统。冯先生所说的“智识主义”,指广泛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这种主义认定,本质是真实的,现象是虚假的。这种主义的“坏处就在于执著概念”,而不知道,“概念本是活东西的死影子,不可执著于它就是了。”冯先生认为,“柏格森哲学的特色因在他本体论上的一个‘变’字,却也在他方法论上的一个‘直觉’。所以他的哲学称为变之哲学,也称作直觉主义哲学。而直觉这个方法从前虽也有人常用,但却没人正式提出鼓吹。现在柏格森把它正式提出,好像一个哲学方法的革命”。^① 因为柏格森提出“直觉”,“更为非理智主义的生力军”。

瞿世英先生认为,现代西方哲学趋势可分为四类:自然主义;惟心论;实验主义;实在论。自然主义“差不多是系统的唯物主义,是将科学所得的结果用来解释哲学的问题的哲学,分朴素的与分析的两种”,代表人物是马赫、斯宾塞、海克尔等人。唯心论主张“意识在先,完全以知识论作根据”,代表人物有欧根、罗伊斯等。实验主义有杜威、詹姆斯。实在论主要代表人物有罗素、佩里等人。他认为,柏格森属于广义的实验主义,即实用主义。瞿先生这里所说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四种趋势,是本世纪初西方学术界比较流行的一些学说。

杨正宇先生认为,犹太人优秀思想家“其多如鲫”,柏格森不是唯一的犹太哲学家,在犹太人历史上,已经有过斯宾诺莎、马克思

^① 冯友兰:“柏格森的哲学方法”,《民铎》,1920,柏格森专号。

等人,对世界产生极大的影响。他认为,如果从他是法国人这一点看,那么他就是很伟大的哲学家了。杨先生不太看好法国哲学,他觉得除了笛卡儿、卢梭、孔德几位哲学家以外,法兰西的思想“对于世界哲学史没有什么大的贡献”。笛卡儿的怀疑论,卢梭的“放任论”,孔德的实证哲学,“曾经扭转过世界思潮”,“为一时哲学界底中心”。然而,法兰西学者“多半以数理为自己学问底中心,所以他们的学说多倾向于方法论方面,而流为一种形式,所以少独创的地方。又因为他们过辟神秘,而竭力趋就现世的、俗情的方面,所以所以他们底学说总少丰润的意味”。^①与他们相比,柏格森“不能不算第一个人物了”。因为柏格森没有法国哲学家的通病。在杨先生看来,柏格森不仅是法国哲学史上的第一个人物,而且放在整个西方哲学史看亦同样是伟大的人物。

杨先生觉得,历代西方思潮大致如下,希腊思想的特点是“知识万能主义”。经院哲学是“经验哲学底信仰万能主义和主情意底哲学”。启蒙时期,“理性的个人主义大倡,而主知之说又加热烈”。对于理性的反对“生出浪漫主义,大倡其艺术与哲学底调和,主张心底生活,情意的生活”。19世纪后半期,“由浪漫主义入自然主义,思想界完全受现实的、实证的、科学的思想底支配。理想主义、情意主义衰微已达极点。一般人对于情意的要求非常热烈,所以柏格森就应时而生”。^②不过,杨先生认为,柏格森哲学并不只是与自然主义相对立,“而是别开了一种新主义”,他“一扫历来思想所有的共通的缺点,而别开一新时代”。杨先生认为,传统哲学的弊病可归结为两个,一是机械的体系观念,一是工具的人生观念。柏格森哲学完全克服了哲学史上的第一个通病,它“是完全的、深入的、流动的、创造的,打破这种坚牢的、机械的体系观念,领我们到一个广漠不着边际的地方。我们得着这种哲学,好似久幽的雀鸟飞进丛

①② 杨正宇:“柏格森之哲学与现代之要求”,《民铎》,1920,柏格森专号。

林,得复选择自己的自由生活,真是快活极了!”^① 柏格森哲学也克服了第二个弊病——工具的人生观。杨先生指出,历代哲学家都把哲学当作“爱智”来解释,“误以为人为求智而生活,简直把生命当作一种求智的工具”。至于使用工具的生命本身究竟如何,却不去过问。“终日在那生命底周围打圈圈,却不能探着那生命底实在,把握那生命底中心。……我们终日只在那儿为生命求知识,却不能直觉到生命底意味……所以一般人除掉了食色两途以外,很难直感生命底意味;皈依宗教呢,那么明明知道它不是实在的,未免觉得掩耳盗铃了。然而,不奉宗教呢,又觉得自己空空虚虚,毫无依归。所以这种苦闷,是现在科学文明时代底一个绝大的问题。柏格森哲学却是直观的,生命的,充实的,深入的,把我投之于‘生命之渊’,但觉得温暖柔软、丰润、欢乐。要我们不欢迎他底学说,又何可得呢?”^②

从上边叙述可以看出,当时的哲学家对西方哲学史的看法有很大的差别,对柏格森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评说也见仁见智,但是,他们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对柏格森哲学的探讨

直觉的探讨是当时讨论的焦点之一。亦抑贬抑褒,各说不一。

张东荪先生认为,柏格森哲学的核心不是直觉主义,“因为柏氏哲学的出发点在研究身心关系问题,在研究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第一,柏氏蔑视智慧初,不由于和直觉相比较;第二,柏氏的本体观与宇宙观,亦不由于直觉而建立”。^③ 张先生承认,直觉在柏格森体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柏格森不是由直觉建立

①② 杨正宇:“柏格森之哲学与现代之要求”,《民铎》,1920,柏格森专号。

③ 张东荪:“柏格森哲学与罗素的批评”,《民铎》,1920,柏格森专号。